

# 文学人类学源起

菲尔兰多·波亚托斯 著

徐新建 史芸芸 译

**内容提要：**文章以作者主编的一部文学人类学文集为由头，简述了文学人类学在英语世界的一种源起。文章强调，对于此前未能很好沟通的两大学科和领域而言，文学与人类学的打通和互补意味着拓展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同时也将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

**关键词：**文学人类学 符号学 非语言交际

**译者按：**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的产生有多种契机和来源。加拿大学者菲尔兰多·波亚托斯(Fernando Poyatos)以自己的学术经历为起点做了开创性阐述。波亚托斯主要从事文学、符号学与文学人类学研究，是一位在非语言交流及相关跨学科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从1992年起担任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化系主任，直至1998年六月退休。作者出版了十本书籍，并因将非语言沟通应用于西班牙研究而广受赞誉。1988年，波亚托斯召集国际学界的一批文学家、符号学家和人类学家研讨文学人类学问题，并在会后主编出版了《文学人类学：人、符号和文学的跨学科新方法》一书。该书原名 *Literary anthropology: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people, signs, and literature*，被誉为20世纪英语世界“文学人类学”的开拓性经典之一。为了有助于学界同仁对其有全面了解，我们组织了对该著的翻译，并将以单篇形式陆续刊出。

在作为全书导论的本篇里，波亚托斯通过对自己及全书各篇作者相关论述的整体介绍，阐述了语言与副语言等的关联，而且倡导跨入到与文学叙事相关的种种文化现象之中，诸如宗教思想、仪式、节庆以及社会关系模式、伦理价值等。前一话题对传统的文学文本予以了扩展，使之可望涵盖从言说、语词、符号到声调、手势、肢体等各个方面；后一主张则把文学的叙事与人类生活的专题系统联系起来，从而拓宽了相关的视野和论域。

本文集的最初呈现是在第 11 届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大会(ICAES)的专题小组会上。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对“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这一术语的简史及其相关讨论以及专题组的由来做一点追溯。

我最早把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和研究领域提出来,是在一篇发表于《符号学》杂志的论文里。该文研究的是叙事文学中人物的非语言表达,以期系统探索叙事文学的历史和文献价值。它不仅关涉语言、副语言<sup>①</sup>、肢体表达以及被特定文化此前的文学作品描述过的体距行为等等,而且还关涉其他非语言行为,例如“外表装饰”(服装、珠宝、化妆)、“对象修整”(武器、佩带、文物),或者“情感展示”(正如许多文学人物在不同场合显示出来的那样)。

后来我以此为题为 1978 年的第十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提议了一个会议代表的“会后会”。会议原定在加尔各答举行,我邀请了约二十位学者参加,然而由于当地机构延迟太久以致学者们大都未能出席。尽管如此,在 Kalyani 大学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的尝试性合作下,我们的会议还是按计划开了,专题叫做“民俗学与文学人类学”,其中的内容包括民间医学、民间工艺与民俗的未来,再就是文学人类学。作为主题发言者,我的名字被冠以“民间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专题组主席。就这样,自我在几年前为这个专题讨论会首次筹划以来,“文学人类学”这一术语便像野火一样偶然地蔓延开来。在印度人类学家为此次会议发布的一份参会人员名单中,“文学人类学”竟然成为了好几位印度学者的研究方向!令我惊讶的是,加尔各答大学人类学系还印制了一份会议分组议程,其中也出现了与之相关的专题名称:“文学和语言的人类学”(Literally(sic)and Linguistic Anthropology),并且把我的名字作为小组主席印在其中,虽然并没有附上我论文情况的说明,也没有其他专题成员的论文摘要。在一个平静的下午,我正在室利罗摩(Ramakrishna)文化研究所的房间里午休,一个年轻的印度学者怒气冲冲地闯进来,手上拿着会议指南,质问我为何不到三楼会场去主持会议。我赶紧起身出发,可无论去主持还是发表显然都为时已晚。不过我还是赶去了,因为与无比混乱和重复的议题相比,我更关心能够同对这一专题感兴趣的学者交谈,因此再一次与虽然为数不多但却真正关心的少数听众一起就文学人类学话题进行了讨论。

我的同事,时任加尔各答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 Bhowmick 教授把我们的讨论文章拿去发表在《人类与生活》期刊上。该刊是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与应用人类学所的所刊。我决定为 1983 年的 ICAES 组织一个专题组。在那会上形成讨论文学人类学的新版本,并构成了我 1983 年出版的论著《非语言交际的新视角》的组成部分。<sup>②</sup>

① 此处“副语言”的原文是 paralanguage,也译为“辅助语”、“超语言”等,通常指叹息、手势等——译者注。

② 菲尔多·波亚托斯:《非言语交际的新视角: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及语言学和文学的研究》,牛津:科学出版社,1983 年。(Fernando Poyatos, Edt., *Literary anthropology: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people, signs, and literatur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 最初设想的文学人类学主题

从最初的文学人类学工作出发,我为此次会议写了研究宗旨,附在各位学者的邀请信上,内容如下:

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文学人类学,是以对不同文化之叙事文学的人类学式使用为基础的。在最小限度上,这种使用包括戏剧、编年史和游记。在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共时与历时研究方面,它们构成了最丰富的材料资源。从早期史诗到当代小说,种种我们能够分辨的写实类型无不应当当作无价之宝加以系统研究。它们通常是记录以下系统的唯一方式(这些方式超出了纪实艺术形式的局限):

(1)可感知系统:包括语言、副语言(语音修饰和单个有意味的声音)、肢体语、体距(对空间的概念化和把握)、时位(对时间的概念化和把握)以及对象与环境系统(从食物与非食物生产、服装、工具和家具,直到建筑、景观和植物群落)等等,此外还包括不同文化塑造的人与动物的互动。

(2)可理解系统:包括宗教思想、仪式和节庆、社会关系模式、伦理价值、礼仪、日常事务等等,还有政治、民俗、流行观念、游戏与艺术。

我们期待的是能使这一有前景的领域能吸引更多跨学科研究的兴趣,同时使文学人类学能被清晰地理解为“经由”(through)文学而建立起来的“人类学与民族科学”。总之就是尝试着让迄今为止尚未很好互补的文学与人类学联起手来。

这样的尝试应当努力用好人类学的理论和观念,收集人类学在不同的民族文学中积累的材料,并且还要承认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叙事(narratives)不仅早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演进(这使它们经常成为唯一的可用资源),而且仍在当代继续记录和保存人类文化。应当看到,尽管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众多学科相关联,有许多研究领域仍可以特立独行。还应看到,人们可以对事物中暗藏联系的不相连部分进行研究(假定有线索将它们连接起来);并且不同的(通常在感知上具体化了的)“可理解系统”(intelligible systems)业已提供了在每一文化的叙事中都可以找到的所有的研究可能。

这时,一些关键问题必将被参与者们提出来,如:

1. 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s)能为今天归属于人类学的各领域提供什么材料和方法?

2. 文学如何补充、包含或质疑对于文化的假设?
3. 通过人类学式的民族叙事研究,能够发展出什么样的跨文化视角?
4. 对于任何一种相关议题的研究来说,文学作品何时作为唯一的文献出现?
5. 文学如何记录文化在可感知和可理解方面的历史发展,以及彼此关联的演变?
6. 文学人类学有助于我们完善新的独特构架,它将为分类学带来什么样的发展? 并又为认识论带来什么样的视角?
7. 在分析选定的某一或一些不同的叙事文学作品时,要怎样把人类学应用进去?

很自然地,在我的方案提出以后,受邀的学者们纷纷反馈了他们的想法和问题。其中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弗兰西斯科·罗瑞吉欧写道:“任何关于它的现状和将来的讨论都应考虑到一些预设性问题,如:元理论前提、研究目的及研究领域的性质。与之相连,我们要追问的是:

(1) 该新学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来自何处?是整个社会科学还是人类学?如果是后者,又是人类学的哪一支?文化的?体质的?还是符号的?认知的?亦或是象征的?

(2) 谁是文学人类学所揭示信息的接收者?哪些信息将被处理?处理后又有何用?

(3) 文学人类学是要关注文学作为制度或活动,还是首先把文学视为文献材料或某一族群或社会信息的载体?对于文学人类学者来说,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书写还是口传?等等。

于是,魁北克会议为文学人类学的首次正式讨论提供了契机。参加的学者都对将此话题深入下去抱以兴趣。促发我提出“文学人类学”的动力来自三方面的兴趣:文字、符号和历史。在长期的文学(主要是小说)教学经历中,我感到不仅要更贴近地关注叙事文本的言说语境,即每个角色用自己的语言说了些什么,以及作者对这些言语互动是如何评价的,而且也要关注作者对角色的非语言行为的描述和评价。而这些行为通常隐含在非语言化的表达中,以及在作者试图传达现实生活时所采用的标点符号中。若照此梳理的话,人物便会更加生动和富有个性,反之则会相形见绌。

此外,小说角色是特定文化的某个时空的一部分。该文化能够或多或少地经由语言与非语言事象以及人与环境的不同互动呈现出来。超语言的人物及环境符号都是正在广阔和快速发展的非语言(nonverbal)交际研究的领域。尽管不少人对“非语言”这个词感到不悦,我还是为“非语言交际”下了定义,即:通过某一文化中所有非语言和身体的、人造的和环境的可感符号系统传递出符号,无论是单独地还是群体地传递,也无论这些传递是否构成了行为或产生了人际互动。

我意识到这些新的视角意味着对文学作品研究中某些新奇方法的有效整合,以及对文学理论中被视为次等和边缘要素的认真看待和系统分析。或者说,至少不像大部分研究者那样,只对,比如说一部小说中的文本进行活体解剖。但我也意识到,当单一学科感到越来越彼此需要时,这种关注人物非语言行为的方式便会激起跨学科的兴趣。叙事文学与人类学都可以接受文字作品的符号历程:文学反映文化,甚至质量不高的书面小说也能呈现特定文化的出色风貌,其文献价值无疑会与时俱增。然而正是经由魁北克专题组以及后来参与本书的作者们的努力,文学人类学才取得了自身地位,并且开创了有待扩展的讨论空间——就如本书最后的论争所显示的那样。

### 对本书作者及其论述的简介

菲尔兰多·波亚托斯(Fernando Poyatos),在发挥此前对小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小说中不同类型的现实主义以及作者在人物的行为描写及其不可分离的关系之间的可能倾向而开始论述,目的在于探寻出文学人类学的某些资源。通过叙事作品对文化进行系统和渐进研究,波亚托斯提议使用符号象征及文化分析理论(这两点他此前都提到过)。二者都可以是历时或共时,或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分析。他通过从不同文化中选取的诸多小说实例来说明人物的副语言、肢体语等描写的功能;更主要的,他还提出,随后要研究叙事作品如何记录了可感知的客观系统(从食物生产到服装)以及修建的、装饰的与自然的环境(包括赋予每一文化以特征的感知系统),再就是理解系统(宗教、社会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后者在前者中也有所反映。

托马斯·温勒(Thomas G. Winner),他为读者呈现了与波亚托斯理论发现相关联的诸多论点,并且在其早先论述的基础上拆离了叙事作品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同构品质。他认为前者不仅当视为后者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变形了的体现。由此出发,每一个读者都将受制于自身的时代和地域。温勒从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塞克(Jaroslav Hasek)的小说中选出一部为例,力图说明其是否反映了当时的革命背景,并对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了分析,即小说的结构性语义形式与语言的运用方式。作为文学人类学的可能资源,由众多拼图构成的小说,“只有在我们掌握其他非艺术性文本时才能提供信息,而对于后者我们可以查对它的数据,包括其所使用的语言。”温勒总结说,即便我们只考察该作品通过怪诞的小说文本所提供的全部审美性的文化编码,它还是可以为文学人类学提供确证。

斯蒂芬·萨肯尼(Stephane Sarkany)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关注于诗学与文学人类学的双重方法。首先,他对比了美国和俄国的文化理论,引用的人物有 Lotman, J. Burgos, Hoppal 以

及 Portis-Winner。前者体现了三个不同的方向:(1)以动力和编码为中心的语言模型;(2)对文本副语言的解读;(3)从语言模型中分离出文化模型的语言学方法。后者围绕着世界的精神呈现发展而来,在其中,地域性和世俗性的各种交际编码被不断地产生出来,并且把思想表述与该时期的物质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当人类学家对象征意向的来源、动力及结构加以考察时,文学理论家们则倾向于读者的想象。于是,二者的范围和功能形成了互补。以对不同类型之读者的不同类型解读为前提,形成了既是诗学又是文学的“社会人类学”(socioanthropology),这便是文学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

露西·简·波特恰柔(L.J.Botcharow),专注于她自身的美国本土文化,以“民主时代”的两位民族英雄为代表,即大卫·克洛柯特(Davy Crockett)和迈克·芬克(Mike Fink)。她对由这两位人物产生的叙述文本(发表于报纸、年鉴和杂志)进行了结构和语义的分析,寻找其中隐含的文化含义,试图对美国社会从1830年到当今的变化作事后“预测”。孤立和交融是这些故事的主旨,但它们也讨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生与死的关系、自由和服从的关系。当迈克和大卫试图调解这些对立关系时,却以死亡告终。当然区别在于,迈克孤独地死去,而克洛柯特是以一种乐观的方式逝世,并被视为英雄,死时伙伴们环绕在他的身边,不像前者那么悲观。通过对这些叙事的组合轴和聚合轴进行双重分析,波特恰柔认为在这些故事中蕴含着符号社会学甚至民族心理学的视角。她“预测”在美国的历史变化中一直存在着贬低个人主义的因素,并更多地强调对社会的服从。

文森特·埃里克森(Vincent Erickson),他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主题是托马斯·曼的不朽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埃里克森将这部作品视为理解当时的德国北部文化(North German culture)和民族的民族志文献,由此将托马斯·曼对德国北部社会的细节性观察与他自己的调查结果相结合(基于也在德国北部进行的过去20年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或是基于民族历史学的重建)。他认为托马斯·曼的观察在数量上不够充足,在质量上也值得怀疑,因此他对自负且天真的文学人类学家提出了严肃的警告。因为,埃里克森说,虽然人类学家和小说家的目的可能相近,但所用的技术会使这两类分析者的目的相反。埃里克森认为,一篇小说不可以替代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民族志。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否为文学人类学提供了那个文化时代足够的历史资料,并且在描述波亚托斯所说“可感知”和“可理解”的文化系统时是否足够的写实,我们可否将之看成民族志著作?他总结说,尽管在理念上,这部小说中的文学语料库适合历时性研究这些系统,但对小说家来说,观念在第一位,现实是被制造出来以适应观念,而不是相反,一如人类学家那样的工作方式。

艾琳·波蒂斯·温勒(Irene Portis Winner)对于叙事文学作为人类学材料的价值问题提出

了和前一篇文章相关的重要观点。她选择了美籍斯洛文尼亚人玛丽·莫勒克和斯洛文尼亚人伊凡·莫勒克来阐明在美国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文化。她假定文化是信息的产生、保存和传播系统,文化文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是需要被研究的意义单位(将信息广泛地理解为包括认知、美学和感性这些有意义的维度,如果它们影响了读者的话)。她认为,文本透露出的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信息,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获取,除非这些信息是在作品纯记实的章节中呈现。温勒采用了尤里·洛特曼的文化文本概念、雅克布森的多派系交流模型和穆卡洛夫斯基的美学功能观念,以对自传体、传记体和半传记体的文本作符号人类学的民族志分析,它们通常是指称、象征、图符或母国文化。

雷吉娜·日尔伯曼(Regina Zilberman)吸取了她早先的符号学、文学,特别是神话研究的成果,将注意力集中于巴西神话和文化。她的分析在两个层面展开,一个由人类学研究支撑并由符号学扩充;一个采用文学理论和文学历史。通过对阿伦卡尔的《依蕾斯玛》(Iracema)和马里奥·安德拉德《马库纳伊玛》(Macunaima)<sup>①</sup>的分析,她提议建立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她解释说,虽然神话已被西方文学专用为表现民族的形式之一,但神话保持了它的自主性,并作为人类学与民族学一个多产的分析领域而出现。它总使人想到叙述模式、文学象征和主题,但当我们在文本中察觉到神话起源的一个或多个元素时,分析不能仅依靠来自文学理论的资源,还须求助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因为神话在叙事作品中的出现,在这两个科学之间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区域。

凯瑟琳·图彭勒(Katherine Trumpener)和詹姆斯·尼斯(James Nyce)关注的是伊迪斯·华顿的《纯真年代》。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使用了来自考古学和当时是新兴学科的人类学的概念、观点和隐喻来建构故事。虽说和其他尝试刻画自己文化的作家一样,她将个人经历与历史事实交织在一起,但却使得自己的作品更多是对“老纽约”的亚文化的民族志式的回顾研究,而不是一部小说。事实上,这部小说的作用在于阐明了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于作者自身的文化时所遇到的困难。人类学术语贯穿了整部小说,华顿经常用这些术语描述纽约,讨论社会的“习俗”、“仪式”、“禁忌”以及“偶像”、“部落戒律”等等,这使读者用民族志者的眼光来检视书中的角色,同时也注意到了书中的剧情。

安娜玛利亚·兰美尔(Annamaria Lammel)和伊洛纳·纳吉(Ilona Nagy)对匈牙利农民的民间故事作了系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这是他们关于这个主题的一部构思已久的新著的一

<sup>①</sup>《依蕾斯玛》和《马库纳伊玛》分别是巴西印第安人作家阿伦卡尔(José de Alencar)与安德拉德(Mário de Andrade)写的小说。《依蕾斯玛》出版于1865年。书名源于印第安土语,被当做白人与印第安土著的相遇象征。作者是巴西文学中“印第安主义”的著名倡导者。《马库纳伊玛》出版于1926年,被视为巴西现代主义的奠基作之一——译者注。

部分。这些民间故事的主题来自《旧约》。她们的研究力图说明通过哪些符号的转换,使《圣经》原文的人物、场景和事件获得了(一些)或直接或隐秘的附加信息。这样就可能对创造和保存文本的社区本身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乡村的民众经常将《圣经》的教导移植到自身的环境当中。基于对来自《旧约》的约两百五十篇故事的调查研究,两位研究者也采用了笔者的模型,该模型在感知系统中区分出了身体系统(例如,肢体语、体距语),身体连接物(例如,烟草、酒精饮料,两者都在恶的一面;服装和服装可能泄露的社会等级)以及客体连接物(例如犁和其他农业工具,家用器具)。笔者提出的术语“culturemes”在这里被连接到了上帝和神话,研究者将其在感知系统内列举了出来,形成了一幅农民日常生活与风俗,包括民间艺术的多彩锦绣。她们还把文化系统包含在建造的和自然的环境之内,并讨论了采用文学人类学方法来研究对象,如何使其不仅能够研究匈牙利农民文化中的人类学特性,同时还能够理解大众的思考方式与宗教,及《圣经》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维尔纳·恩宁格(Werner Enninger)的论文,作为他过去广泛研究阿米什人的一部分,试图促成正在形成的文学人类学范式。作者在同时期前工业化民族的文学和口头传统中寻找人类学资料。此外,在案例研究层面,该文描述了书写和口头文本对早期阿米什人宇宙观的建设和持续重建的作用。在宇宙观的所有变量中,论文选取关注了社会及(线性)物理的时间如何转换成为时间的集体经验模式。除了对研究对象作民族学研究之外,恩宁格还论及了一些他认为文学人类学会感兴趣并且具有文化特异性的现象。他分析文化中的价值、规范和制度,试图说明文学人类学家观察到的事实可以说为社会文化所必不可少,对宇宙观的社会性建设有重大意义,并暗示对该文化中时间的社会性建设有重大意义。

吉拉·大卫(Gyula David)讨论了另一个乡村世界,也就是特兰西瓦尼亚人的世界,并论述了在故事中描写过它的三位作者:匈牙利人塔马西·亚伦、罗马尼亚人帕维尔·丹和德国人欧文·维特施托克。据大卫说,该比较分析依据的是波亚托斯关于文化人类学的论文。分析专注于以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语文学中被称“特兰西瓦尼亚”的趋势为特征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与历史上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居住在同一土地上的互依性相关,也与他们精神、个性和世界观的亲性和性相关。大卫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了分析:人和所处的环境、人和其他族群的人以及人和超验世界,并得出了对文学人类学研究来说有趣的结论。

威廉·博霍尔(William Boelhower)的文章试图呈现一条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依据波亚托斯所设定的身体、客体、环境和知识系统,该方法基于一个文本模型,即先锋自传。这种自传形成于20世纪早期,表明了人的自我在所居环境中的构想方式、客体与人造环境状况帮助新自我定义的通常方式以及这两大范例的转变。博霍尔借关注文本的模型(与单



独的文本相区别),以描述出范例的特征。这些特征开创和决定了更分散的个例,并更好地体现了所属的文化系统。因为他意识到,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通过,而不是不顾审美策略来验证一个可以生产人类学信息的文学方法。在此基础上,在这个文本模型背后,他的生成叙事剧(fabula)体现了特殊的现代情况下的生境(habitaré)问题。这就展开为对美国生境和“在被推崇的自我的万神殿背后”之身份模式的解构。博霍尔采取了双重策略的方法:他对组成文本模型中空间逻辑的并列的文化“语法”作了并行调查和分类;而且对模型的蒙太奇系统进行了符号学阐释,即根据特定叙事的重新功能化,单个文本中广博的元素如何合并、加工和变形。另外,基于对文学重复、文化的陈词滥调、典型场景和常见主题的框架性分析,他加入了巴赫金(Bachtin)的叙事分割研究和波亚托斯的方法。因此,在包容了从文本层面到宏观文本层面的通路的范围内,博霍尔使用的方法在人类学中证明是有效的。

最后,读者会发现弗朗西斯科·罗瑞吉欧(Francisco Loriggio)对航海小说的研究形成了一篇令人激动的压轴论文。因为这篇论文除了提供在面对文学人类学时所作的丰富的理论探讨(参考了大量文学理论家和符号学家的作品)之外,他还对英国作家(如康拉德、哈代、劳伦斯、福斯特),美国作家(如梅尔维尔、吐温),意大利作家(如帕索里尼、西隆、韦尔加、帕维斯)和西非作家(我的一些西非学生——如阿依·阿尔玛赫、淳弩阿·阿奇比说,这些作家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常是从西方回来、被当地人称呼为“去过的人”)等的航海小说作了综合评论,因而提供了同样丰富的理论应用。罗瑞吉欧考虑了这些故事中不同的方面,比如,旅程的动态性暗示了虚构旅行的分类法;每一次结合都会产生一种不同的类型。在他由这些作品看到的理论问题中,有一个是源于小说关注在原属环境之外主人公与现实的冲突,并伴有特定文化系统的信息。然而只有当被嵌入由故事的宏观续发事件所承载的宏观价值中时,故事的微观续发事件中体现的微观价值才有了意义。因此在一个层面上,会强调体距、肢体语,或其他在原文中更难察觉的资料。这就令我们怀疑,如果不考虑研究对象的文学性,文学人类学是否还能存在?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必须处理一段人类学经历时,主人公被突出地置于人类学情境中,这时就会遇到认识论的困境。罗瑞吉欧分析的这些小说作为基础文献,体现了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联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学事实,因此,罗瑞吉欧总结说,文学人类学不仅应关心文学中的人类学,还要关心对文学的人类学研究。

萨丽塔·帕米克(Sarita Bhowmick)本来是这本书的另一位撰稿者。我在 1978 年的 ICAES 上遇见了加尔各答大学的人类学系普拉勃德·帕米克教授和他美丽智慧的女儿萨丽塔。萨丽塔获得过加尔各答大学的最高荣誉,之后又获得了兰契大学的最高奖。年仅 26 岁的她已写了好几篇文章和几本书,是一个孜孜不倦且多产的人类学家。不幸的是萨丽塔死于 1982 年

6月12日的一场车祸,当时正与社会调查与应用人类学协会会长 J.K.博斯教授共同驱车前往遥远的 Bidisa 参与一场研讨会。我邀请了萨利塔与她的父亲前来参加魁北克的讨论会并期待着他们的光临,但在大会前只收到了她的《〈罗摩衍那〉:作为文学人类学资源的史诗文学》论文的简短摘要。摘要写道:

《罗摩衍那》这一部伟大的史诗反映了印度的集体无意识。它描绘了一幅三种民族文化系统的巨大差异图画,并分别集中于不同的理想。《罗摩衍那》是文化系统相互冲突的一个故事,同时也体现了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从中获得文学人类学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描述了事件、生活方式、观念和期望,还表达了文化矩阵中的交错族群的各色观点。本篇论文讨论的就是这些事例的细节。

我希望本书会为它的读者提供一个坚固和刺激的基础,供其对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进行更多的思考,以及为它进一步的研究提出更多的建议。在编写这本书时,一个类似的讨论会正在计划当中,该讨论会与第12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相关,将于1988年在萨格勒布举办。希望下一次讨论会能贡献出像在魁北克市促成发起文学人类学一样的成果。

(菲尔兰多·波亚托斯,加拿大布列斯威克大学;徐新建,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史芸芸,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毛巧晖】